

我在美國撰寫關於鄂蘭的博士論文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是：「漢娜·鄂蘭是誰？」通常我的答覆會從她的出身背景或成名著作說起：「鄂蘭原本是猶太裔德國人，二次戰前逃避納粹迫害移居美國。她是《極權主義起源》及《人類境況》的作者，另外還寫過《論革命》、《共和危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等。她的重要性在於……。」對這個冗長沉悶的答案我的聽眾通常也會報以無聊故事應得的報償——或者是虛偽不過的恭維「哦，是嗎？真了不起」，或者是直接了當的不耐煩「對不起，我要洗個手」。有時爲了挽救聽眾，我會石破天驚地冒出一句「她是哲學家海德格的秘密情人」，馬上昏昏欲睡的人睜大了眼睛，上洗手間的人也轉身回來。我常爲自己的手段感到羞恥，但更多的是無奈與不公。我真希望有一天人家不再將鄂蘭定位爲「海德格的情人」，而是稱呼海德格爲「鄂蘭的情人」。

我的期盼終於部分地實現。耶魯大學前年出版了一本記述鄂蘭與海德格情史的書，中文版今年在台發行，書名是《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作者愛婷爵根據目前仍未公開的鄂蘭／海德格通信以及國會圖書館的資料，集中處理了兩人長達半世紀的激情、恩怨與分合。這雖然不是第一本揭露海德格與鄂蘭戀史的書，卻是最直接、最詳盡、也最生動的一本。更重要的是，愛婷爵完全站在鄂蘭這邊，用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話語去指控海德格的昏聩、虛偽、懦弱與自私。鄂蘭與海德格結識於一九二四年，當時兩人是馬堡大學的師生。海德格三十五歲，已婚且育有二子，鄂蘭則是年方十八的如花少女。海德格深邃的哲思與講課的魅力攫取了鄂蘭的芳心，短短幾個月內他就從她的師長、朋友變成情人與保護者。兩人的秘密戀情維持了五年左右，鄂蘭在覺悟海德格不可能爲她放棄家庭及學術聲譽之後，黯然下嫁他人。但是在離別的書信上，鄂蘭仍然深情款款地寫著：「以神的意旨／我死後將更愛你。」

然而鄂蘭與海德格的交往並不因此劃下句點。納粹崛起後，海德格狂熱地支持希特勒的雄圖霸業，反猶問題成了鄂蘭與海德格兩人反目的癥結。一九三三年鄂蘭逃離德國後，整整十七年間兩人毫無音訊往來。等到鄂蘭因《極權主義起源》而享譽歐美學界後，他們才又戲劇性地會面。海德格因受納粹戰敗牽連，失去了講學及發表的自由。鄂蘭不計前嫌爲他辯護、幫他出版。她以寬宏

回報來證明自己已「走出海德格的陰影」，但是她的獨立與自信則刺傷了海德格潛意識裡仍想操控一個少女的心理。鄂蘭說：「我知道他受不了到處看到我的名字，也受不了我寫的書。過去我總是不停地對他說著有關自己的謊言，假裝著作、名聲那些事都不存在。但是我突然厭倦了這種欺瞞，我突然決定撒手不玩那個遊戲了。」戰後的復合不僅夾雜著兩人相對地位的起落，還糾纏著海德格夫人的妒意、鄂蘭恩師雅斯培對海德格的憤怒，以及鄂蘭丈夫對譯介海德格著作的精神支持。這段情史事實上不只是情史，而是二十世紀哲學史血肉的一部分。愛婷爵把這些愛恨情仇描寫得栩栩如生，再加上譯者的生花妙筆，使這本書幾乎成了哲學版的羅丹與卡蜜兒。

熟悉鄂蘭思想的人當然不願意讀者對鄂蘭的興趣僅止於她的羅曼史。鄂蘭才情出眾，涉獵廣泛，舉凡政治、歷史、詩歌、藝術、社會運動、族群認同、女性意識等，她都有別出心裁的見解。她的《極權主義起源》（中文有時報文化譯本）是分析納粹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不可或缺的經典。她的《人類境況》、《論革命》、《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共和危機》等則是深入瞭解政治行動理趣及二十世紀人類生存危機的政治哲學作品（可惜除了《共和危機》外，餘皆無中文本）。猶太認同問題是她的族人最感興趣的領域，她的《猶太賤民》與爭議一時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供了這個方面討論的基礎。至於女性意識則是近年來新興的研究焦點，鄂蘭本人並未留下系統性的論述，不過有心的讀者仍可以從《范哈根傳》以及鄂蘭的通信找到豐富的詮釋空間，愛婷爵的鄂蘭情史為這種閱讀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鄂蘭的學術成就無法與海德格相比，這點連她自己都明白承認。可是哲學情侶的關係並不是學術地位誰高誰低的問題。我們不能永遠從海德格的角度來看鄂蘭的存在意義，就像我們不能老是從羅丹的立場來瞭解卡蜜兒。海德格與鄂蘭之間既存在著哲學師徒傳承超越的問題，也交織著「一個德國男人與一個猶太女子」的情感糾葛。在情慾取予與政治進退的評斷上，《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總算還給鄂蘭一個公道，儘管這個公道也是姍姍來遲。

書目：

《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驥華譯，台北：時報文化，民 84。

《共和危機》，蔡佩君譯，台北：時報文化，民 85。

《漢娜鄂蘭》，黃怡譯，台北：聯經，民 79。

《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蘇友貞譯，台北：麥田，民 86。